



# 从管理到服务:知识视野下的政府模式变革

周军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促进了知识的迅速增长和广泛应用,从而为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人们在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形成的制度体系迫使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与此同时,人们也按照这种科学精神去建构社会,并通过管理型政府去实现社会治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获取的成本变得极其低廉,知识的广泛共享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事。然而,在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下,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却陷入到越来越大的困惑当中。随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基于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性科学技术正在兴起,它们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交往和思维方式的冲击激发了人们对政府模式变革的强烈呼吁,并且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潜力和被滥用的可能性又要求我们必须对社会治理做出恰当规划,并积极建构起服务型政府这一全新的政府模式。

**关键词:**知识;摹仿技术;创造性技术;启蒙运动;政府模式;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4)02-0111-08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知识都在其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而如果说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科学的或经验的)知识经常受到宗教的遏制和打压,那么,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则无疑释放了知识作为一种无穷力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知识的迅速增长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工业社会之根基的话,那么,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则总是试图去确立和巩固知识的这一地位,甚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对它指手画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科学技术(science & technology)的发展则又为人类实现知识的共享和低成本获取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因而,知识作为一种力量的局面和观念正在被打破,因为它越来越具有开放、共享,以及易于获取的特性。为此,当人类社会面对日益增长的共享知识时,所需要做的便是如何在知识共享的基础开展合作行动,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新知识,并将之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积极的意义上,知识的增长和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尽的福祉,而在消极的意义上,它又存在着被滥用而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可能性。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成就是非凡的,一旦它们被滥用,其后果也是极其恐怖的。科学技术的滥用不仅可以成为少数人、少数集团或少数国家控制整个世界的手段,而且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先进科学技术都可能在瞬间将人类及其所生活的地球彻底毁灭。因而,鉴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当我们再一次站在社会变革运动的转折点上时,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我们过去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规划社会治理中,积极变革政府模式,引导人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应用这些日益增长的知识,创造具有革命意义的科学技术,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

收稿日期:2013-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3YJA810011)

作者简介:周军,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型政府。

## 一、增长: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与扩散

从科学史的事实去观察,知识的持续增长以及其中时常出现的一些具有突变性质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知识(knowledge)生成于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和科学探索过程。尽管既有的科学和技术尚未能挣脱自然规律的约束,但人类还是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活动之中。因而,知识一方面源自于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被加以应用并生成新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方面的过程共同促成了人类社会的知识增长。如果说认识自然的过程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在知识应用的意义上,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表现则建立在人们利用自然界来创造物质舒适性的能力之上。在知识经济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将这种能力视作经济绩效,然而,我们也同样意识到,这并非知识范畴和人类经济能力的全部内容。到目前为止,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界当中,那么,知识的范畴就应该包含着人类关于这两个世界的知识:一是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认识,二是对社会事实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在工业社会的科学发展史上,人类关于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质上是对关于自然界的认识的一种摹仿。因而,我们才会看到,人们关注的有用知识通常只涉及那些能够满足人们实用需要的关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知识。基于这样的一般观念,知识的特性通常不指向人类社会,而指向自然界。在知识的认知性和技术性中,认知性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即认识自然,而技术性则回答了“如何做”的问题,即改造自然。如果说在工业社会的科学中,认识自然的目的在于改造自然,造福于人类社会的话,那么,通常人们就会在简化的意义上用技术来替代知识,尽管技术并非知识的全部。因而,技术促使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

与整个社会的知识存量相比,不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者,个体所拥有的知识以及能够用它们来做什么事情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一项知识仅为一个或几个人所拥有而无法为社会所共享,这些知识的价值显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即便实际上它们是非常有价值的。因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创造了能够使知识得以传播和扩散的语言、符号、

图式、模型等,这些群体共享的符号系统能够大大减少人们获取知识的成本,因而使得知识从人的头脑中转移到外部存储装置中,也就实现了人类对知识的共享,尽管当我们获取它们的时候仍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比如,印刷用的纸张、油墨等材料,进行知识外部存储时所进行的编码,以及人们在进行知识获取时所投入的解码成本等。更为重要的是,外部存储给人类进行知识再加工和再完善增添了不少障碍。即便如此,外部存储还是为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创设了良好的条件。人类社会在18世纪以前的绝大多数知识实际上都是不系统、非正式的,而且通常都是非编码化的,知识的传播方式也是非常有限的,有时是师徒之间的垂直传递,有时是个体之间的横向交换,而且知识经常是不完整的。在这些不完整的传播中,知识将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一是在传递或交换中不断地流失而慢慢地被人们遗忘,二是流失后的残缺知识和信息需要进行补充,在这种补充过程中又重新建构起了更加完善、更加严密、更加实用的知识。而不论是哪一种命运实际上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人类进入工业化进程之后,知识传播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使得人们可以从书本中成本低廉地获得知识,尽管这些都是经过编码的科学事实和技术指南,但作为已知的或常识性的知识,它们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的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扩展、完善,或者否定、扬弃它们做好了准备。

在知识传播技术的发展中,正如爱森斯坦所指出的,印刷术的出现为维系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在她看来,早在16世纪,印刷术就为“村与村之间的隔阂架起了桥梁”。尽管她承认“早期印刷的技术文献对科学与技术的影响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她仍然坚信印刷术使“社会意义上有用的技术”的大众化成为可能。<sup>[1]</sup>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认识自然的知识掌握在了统治者或少部分社会精英手中,但知识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流失并为社会底层所掌握。工业社会的科学知识尽管存在着一些权威机构和专家团体,但仍然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科学体系中向社会弥散。因而,尽管知识传播时常受制于知识的组织方式、存储技术,以及由谁掌控知识的获取,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们之间的知识传播总是不断地发生。正如莫基尔所描述的,“如果持有知识的人认为知识是财富、权力和特权的源泉,他们就会倾向于保护知识,并妒忌别人获取。严守秘密和排斥性的做法毫无

疑问会人为地增加获取成本。可以相信,语言、特定表示方法和行话也是获取知识的障碍(到现在仍是如此);如果科学家想要让公众和资助者理解他们,他们往往会撰写科学著述的‘普及’读本。”<sup>[2]19</sup>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传播就不光受制于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且还取决于一些其他因素。然而,这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认知自然的知识是如何扩散到人类社会建构过程中来的。

我们看到,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人类积累起来的这些科学知识被复制到人类社会的建构过程,一方面它表现为对自然现象的复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自然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原理和法则的复制。知识对于认识到它们的人来说是有用的、易于接受的,而对于那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们的人来说,则是无用的,甚至是难以接受的。因而,在工业社会的科学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摹仿的踪影,因为,只有摹仿了自然界客观存在的那些知识才具有严谨性。如果我们用严谨性(tightness)来测度知识的话,那么,知识的严谨性无疑反映在两个层面上:一是自信度,这是说知识能否有效地自我辩护以及被清楚地论证或检验,因而说服人们接受这项知识;二是接受者的意愿,这是说知识能否给予人们以信心并愿意运用这项知识去开展行动。在一个知识逐渐增长的社会里,知识的严谨性越高,则意味着人们越乐意于将之视为其观念、信念,以及话语规则中的一部分,因而抵制这种知识的可能性就越低。在摹仿的科学中,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实显然是有自信度的,这就为知识的社会普遍接受奠定了基础。而在工业社会的科学体系中,话语规则通常不是由大众自行建构起来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威、专家告知公众的,关于自然界的真相也随着这些话语规则被人们接受和相信。因而从消极意义上来说,政治体系所任命的权威和专家在知识的探索 and 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非常奇特的角色,他们或者迫使人们接受那些从自然界复制过来的知识,或者通过自我辩护、自我论证和检验来证实这些知识,更为重要的是,通常这些权威和专家只承认那些按照知识严谨性标准而生成的知识,因而也就将人类社会的创造能力扼杀了。创造性的知识是具有自信度的,但这些知识却未必能够迅速产生非常广泛的接受,而这又恰恰取决于权威机构和专家团体。正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所描述的,“当一项新的发明最初被提出来时,几乎所有人在一开始都持反对态度,而可怜的发明者总是受到那

些急躁的权威人士左右攻击……能够经受得住这样责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更糟的是,当围绕新发明的无休止争议逐渐平息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可怜的发明者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已经因为此发明而债台高筑。”<sup>[2]219</sup>如果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打破了宗教裁判所的权威,那么,在工业社会里我们同样建立起了类似的裁判所。

## 二、管理: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

人类社会在创造促进其经济增长的科学技术因素的同时,也创造了各种抑制其长足进步的各种障碍和阻力,因而,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进步中呈现出了“锯齿效应”(ratchet effect)。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前进和停滞是技术发展中往往交替出现的两个过程。在推动人类生活进步的同时,技术一级又一级地走上更高的台阶,达到新的平衡,然后保持相对的平衡,因为技术如果不是从一场‘革命’向另一场革命前进,它就停滞不前。从各种迹象看来,减速因素似乎不断在起作用,我很想进一步强调减速因素的深远影响,但这又谈何容易!技术的进步和停滞贯穿着全部人类历史。所以,即使研究技术史的专家也几乎从未完全掌握技术史。”<sup>[3]</sup>尽管我们同样无法非常清楚、准确地罗列出那些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减速因素,但在考察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时,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通常带来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同步增长,这两种增长之间既是相互促进,又是相互钳制的。当财富和成功带来的并非是进取精神而是不同方式和不同类型的掠夺和寄生时,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渐地被扼杀了。工业社会支持自由竞争的制度以及管理型政府在获取经济增长动力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不同时期里的各种既得利益团体为了维护自身在现有科学技术水平中的优势地位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利益,往往会采取非市场的手段去阻止科学技术的进步,以维持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掠夺和寄生地位,因此,我们说,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存在着这样的障碍和阻力,它们不是人的所谓内在惰性的某种体现,而是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的根本缺陷,正是这种缺陷催生了人性中的消极因素而生发了掠夺和寄生的行为。

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关系上,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被社会接受度拖垮,或许无法归结为技术

本身所具有的自信度,但却可以归咎于技术的认知基础。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进步受挫又根源于技术认知基础的薄弱,也就是说,技术缺乏科学原理的强有力支撑。一项新技术的诞生一般都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然而,如果它缺乏坚实的认知基础的话,那么,这种革命性是不可能汇聚成一股历史推动力,而促使人类社会在这一时代源源不断地创造和发明新技术。我们看到,人类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的绝大多数技术发明可以说都是偶然的发明。发明者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发明的这些新技术背后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但是它却依然是有效的,即便规模很小且时有误差。对于一个探索者或发明者来说,如果他对自然原理并不是非常清楚,那么,他只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去碰撞获得成功的运气。即便个别人幸运地取得了成功,然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认知基础薄弱的技术很难为人类社会带来大规模、连续的技术扩展、改进和应用。然而,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则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对于一个发明人来说,写一套操作指令集以刻画某一技术时,社会必定已经知晓与该技术有关的自然过程的某些知识,这是隐藏在该技术背后的。”<sup>[25]</sup>科学与技术之间似乎就达到了一种相互交织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科学原理是指导技术发明的基石,而技术进步则在人类生产、生活中传播、扩散有用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所确定的那些科学原理为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而工业社会则在此认知基础上不断涌现出持续的技术发明,并在科学与技术之间达到一种可持续的良性状态。因而,我们看到,工业社会的科学与技术实现了知识增长的螺旋式上升。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治理方式却在支持竞争行为中刺激人们争相追逐对技术发明的攫取,而忽略了对科学原理的探究,即便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基础科学,也是从属于通过技术发明来促进经济增长、获取竞争优势之目的。因而,这也就给人类社会持续的知识增长埋下致命的缺陷。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对知识存量增长和知识严谨性的追求又迫使工业社会的科学体系走向了摹仿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思路。在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科学活动中自 17 世纪兴起的“实验”观念和方法在启蒙运动中受到了早期思想家们的极力推崇。实验哲学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建构起了相互联系的语言工具,围绕着实验而设计出来一

整套机制促进了工业社会的知识增长,人们甚至相信只要设计出合理的实验方法,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案。正如凯泽尔所说,“正确实验方法的逻辑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和通过合理描述而组织有序的有用事实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或‘理论的’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验和描述被证明是科学最有效的方面。”<sup>[4]</sup>这或许就是工业社会的科学精神,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是有序的、理性的、可预测的,这种信念在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者的心目中深深地固化,人们相信即使现有的科学探索还尚未完全理解到自然的真相,但他们相信自然是可知的,人类终归能够通过实验的科学方法明白我们所身处其中的自然界。因而,在整个工业社会的知识体系中,科学家们所宣称的那些绝对真相则是通过实验方法获得的结果,它们既有对自然现象的计算,也有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建构政府的过程中,人们也是按照实验方法和科学精神去进行官僚制组织的设计,并按照自然秩序原理去建构政府中每一个对象之间的等级关系。正是由于政府本身就是按照这样的自然原理和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因而,它在骨子里都相信,惟有这样做才是合理的。其逻辑的和现实的结果是,管理型政府通过对知识的管理去建构一种封闭的体系,而这种体系也是建立在通过实验获得真相的科学精神之上。

按照启蒙思想家们的设定,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扩展,就是要满足于人类实用主义的需要。崇尚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者深信培根的实用主义观念,努力降低知识获取成本,使人们在相互竞争的市场中通过不断的创新活动来实现致富。企业家们乐意于搜罗各种有用的知识以用于其赚钱的目的,人们关注的是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中摹仿而获得的新工具、新设备对其是否有用,其次才会去关心其中的科学原理以及这些知识是否可靠、正确或者科学。因而,在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中盛行着“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观念和方法。在这些解释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各种工具中,特别有趣的是,统计学也在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崛起了。之所以认为它的崛起是特别有趣的,是因为在牛顿主义者看来,人类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严格遵循确定论的,而不是随机的,因而,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甚至不承认这个世界蕴涵着不确定性。在人类科学活动中经常会出现机理不明、信息不完整、材料太多、距离太远、无法逐一研究的各种情况,而人类又需要得到关于这类自然现

象的经验规律和某些知识,那么,采用统计方法和概率论方法就不那么奇怪了。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除了某些例外之外,一些算得上共识的方面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一是经验认识所呈现出来的某些规律性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严谨性;二是从大样本中得到的结论终归是胜过个人经验的。因而,统计学和概率论的方法不仅没有逃离出这种工具主义的科学体系,反而使人类的科学活动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过度依赖于这种研究方法而无法自拔。

如果说科学能够帮助人类解开宇宙和人类自身的奥秘,那么,通过实验数据去证实或证伪则是通往这条道路的桥梁,而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则无疑创设了各种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制度。我们看到,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科学知识并不像今天这样可以自由交流和广泛传播。在宗教依然统摄人的精神世界的时代里,科学知识被严格限定为是具有排他性的秘密,掌握科学知识并试图传播它们的人可能会遭遇极其悲惨的命运。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将宗教对科学的排斥和打压视作自己的批判对象,也便包含着要求科学知识普及、传播、共享、开放的要求。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也逐渐走向了开放,它们不再是被隐藏起来的秘密或私人独占的财产,而成了社会可以免费共享、自由交流的公共资源。直观的证据是,为了使科学知识在社会当中达到共有、分享,人类社会建构起了一整套通用的词汇、符号、图式、模型,以及达成共识的各种标准。但是在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体系中,“开放”适用于科学知识,却不适用于技术知识。如果说科学知识是一种公共资源,可以供人们免费获取、自由分享的话,那么,技术知识则完全是按照私人财产来加以保护的。因而,在工业社会的制度体系中,管理型政府是通过专利和技术秘密这种保护技术知识的利器来建构知识应用的封闭性体系的。仔细观察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体系,就会发现,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在保护上似乎出现了进一步分化:一方面,科学知识被视为人们可以自由分享的公共资源,尽管没有采取财产保护的制度,但却建立起了某种形式的奖赏制度;另一方面,技术知识因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经济性而被视作私人财产加以保护,但技术知识的保护也出现了再分化,即授予技术知识以专利,这样人们就可以公开、免费、自由地获取和使用这些知识,而另一些技术知识则又是通过技术秘密的方式加

以保护的,这样就人为地增加了获取这些知识的成本,设置了分享、传播和使用它们的障碍。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倾向于将知识产权视作自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很好地贯彻了启蒙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并将之应用于有用知识的保护上。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设定,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引发了那些关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争论:一方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为相互竞争的经济供应了技术进步的动力,而这动力源自于人们源源不断创造新知识的内在动机;而另一方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产生了对有用知识的垄断,它阻碍了知识的有效扩展、廉价获取,以及广泛共享。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巨大的科学技术成就,它得益于人类将关于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知识汇聚起来,创造能够满足人们实用需要的有用物品。然而,单纯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不会有利于人类创造如此壮观的文明成就,反而会在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负反馈机制中导致两者都陷入停滞、疲乏、萧条的局面。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因此而僵死过去,因为在工业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三个促进知识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方面:一是当人们普遍地将作为公共资源的科学知识和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知识加以严格区分时,很多像伦福德伯爵、本杰明·富兰克林、汉弗莱·戴维这样的发明家则信守自然哲学家公开知识的承诺而拒绝将自己的任何一项发明申报专利,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们的个人品格为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是尽管国家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竞争的态势,但在知识交流上,政府则经常通过外交渠道积极获取他国的技术信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获取成本的降低以及知识在国家间流动的可能性增强了工业社会技术知识的流动速率和广泛传播;三是在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的保护下,很多知识被作为私人财产而用于经济的、私人的目的,然而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尽管在工业社会领域分化所形成的领地意识中,知识交流和传播仅仅局限于篱笆遍地的同行之间,但是信息标准化却几乎在科学技术的各领域达成了一种共识,人们在进行知识交流和沟通中使用属于该领域的共同术语。信息标准化建构了一种同行业通用的基本语言,换句话说,来自任何领域的人只要掌握了这种基本语言,也就获得了打开通往这一知识领域之门的钥匙。尽管在工业社会分化的

科学体系中,要想实现知识的广泛交流和沟通,一个人可能需要获得许多把这样的钥匙,但至少这些方面都促进成了人们之间的知识交流和沟通,并基于既有知识而进行的创新活动成为可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管理型政府想方设法地去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最终也没有能够完全达成这样的目标,反而因为它所期望建构的封闭性出现了漏洞,才挽救了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而这一点也给我们在思考政府模式变革及其治理方式创新时提供了一种启示。

### 三、服务: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活动

反观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人类智力的发展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可以说处在“觉识”的时代,而在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的智力水平显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出了“觉识”的时代而进入到“摹仿”的时代,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和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因为它们为人类智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将科学转化为工业生产的技术则是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而不论科学还是技术都是人类社会知识增长的标识,都是人类智力发展的结果。从历史事实来看,正是人类社会走向摹仿时代的这次启蒙运动促成了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走向了理性化,并在知识传播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广泛的扩散,尽管很少有人真正地注意到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性,但历史事实却证明了紧随启蒙运动之后发生的工业革命没有像以往一样突然爆发而又偃旗息鼓了,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持续的,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不断地将人类社会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当然,工业社会的科学与技术中还存在一些不同于一般技术的新发明,如热气球技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挑战地球重力的尝试。这一发明与工业革命历史上的其他发明都不太一样,可以视之为另类的重大发明。”<sup>[2]50</sup> 尽管这样的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另类”意义,但却反证了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科学技术绝大多数都不具备挑战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意义。因而,也就证明了人类在工业社会以及之前的历史阶段中,科学与技术主要是在摹仿和复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它们所表现出的创造性

实际上应是摹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

当工业社会走向了它的顶峰,而人类社会迈上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人类智力的发展需要再一场的启蒙运动来为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新时代做好准备,这场启蒙运动正在发生,它引导人类社会走向“创造”的时代。在科学技术发展上,以纳米技术、网络技术、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预示着人类的智力发展进入到又一个新阶段,预示着人类正在迈入后工业社会,预示着人类智力发展史上的“创造”时代的到来。如果说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百余年里,人类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进步都是令当时的人们感叹的,然而,人类社会进入 20 世纪之后,即便我们是用工业社会的科技发明的标准去衡量也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技术进步都是对既有技术的改进而不是全新的发明,并且 20 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了“综合”的特征,即将以往的技术发明进行重新组合而得出一些改进了的发明。当人类社会迈入后工业化进程之后,人们越来越发现依靠过去那种摹仿和复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所进行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最终走向了疲劳乏力和后劲不足。人类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再一场的启蒙运动,它将启蒙人类智力的发展走向“创造”的时代,而创造时代的创造性科学与技术不是建立在分析和摹仿之上的,也不是对人类已有的科学技术成就的抛弃,而是建立在通过综合既有科学与技术去实现在知识共享基础之上的创造性活动。

20 世纪后期的这些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科学和技术的兴起,既是人类社会迈入后工业化进程的标志,又为人类迈入这一创造性时代做好了铺垫。如果在知识传播的意义上理解创造性技术的兴起的话,那么,我们便会发现,计算机的网络化与独立工作的计算机在其知识储备与共享的意义上是不同的。20 世纪后期的信息技术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传播的外部存储方式极大地扩展,人与人之间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不仅日益迅速,而且成本极其低廉。因而,技术方面的进步通过降低知识获取成本而扩展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和渠道。如果说在工业社会里还有一些知识是某些人知道而其他人不知道的,或者说有些知识是这个社会知道,而其他社会不知道的,那么,在人类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这种局限性或有限性正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而被突破。因而,很多人也将人类社

会正在迈入的这个时代称为“大数据时代”(迈尔-舍恩伯格)。然而,按照工业社会的科学与技术去进行知识传播,人类必然要遭遇这样的问题,即“并非所有技术都能得到明确表述、可以编码化或用语言表达出来。即便明确表述,也很少有完整的表述,很多表述都留给用户自己去诠释。”<sup>[2][1]</sup>在大数据时代,知识的传播将越来越被超级数据所替代,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数据的海洋中寻找有用的知识和信息,而“删除”数据和信息所要耗费的时间和成本将越来越高,甚至令人痛苦不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将越来越失去自己诠释的能力,这种能力丧失的可怕结果是人类创造能力的衰落。

如果说后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是创造性的科学技术,那么,它们所需要的是创造性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发现之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之上,而这又是以知识共享为基础。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和信息爆炸式地向我们涌来,当我们被动地去接受扑面而来的进程时,如果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从中删除掉那些我们不需要的或者对我们没有用的知识和信息的话,那么,人类在后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将丧失创造的可能性,留下来的只是在漫无边际的知识和信息中查找。因为,在工业社会的分析科学中,知识和信息都是碎片化存在的,人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也将知识和信息进行碎片化处理。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人们总想要通过对单个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分析,看它们对决策活动是否有用,然而,正如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所指出的,“随着大数据的出现,数据的总和比部分更有价值。当我们将多个数据集的总和重组在一起时,重组总和本身的价值也比单个总和更大。”<sup>[5]</sup>正是由于我们对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的某种迷信,才导致了我们的忽略了总体的价值而陷入无限的困扰当中,因而,正如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没有迷信农业社会的科学技术一样,“我们不应生成对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科学及其技术的迷信,我们应当相信,后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技术会从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技术中继承一些有用的因素,但在总体上,将实现对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技术的扬弃。”<sup>[6]</sup>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再次处在了新的历史转折点上,科技、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这场激烈的社会变革运动,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也应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变革运动中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正如卡普拉所说

的,“当一种文化变得过分僵化——在其技术、思想或社会组织中——从而无法迎接条件变化带来的挑战时,衰落便发生了。这种灵活性的丧失伴随着和谐的普遍丧失,因此导致社会失调与混乱的发生。在这一衰落和解体过程中,尽管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仍然强行推行其过时的思想,但是它们却逐渐濒于解体,而新生的、具有创造力的少数正以其独特的才能和不断增强的自信心面对着这些新的挑战。”<sup>[7]</sup>创造性的科学和技术正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兴起,一方面,它们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并要求一切形式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都要与之相适应,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必须进行政府模式的变革和治理方式的创新,而不应该用旧的制度框架和过时的思想来捆扎人类社会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另一方面,创造性的科学和技术所蕴含的潜力是以往的任何科学技术都无法企及的,这不仅表现在它们为整个人类社会造福的潜力上,也体现在了它们可能被滥用而招致人类濒于毁灭的潜力上,因而,人类社会不仅处在了文明进步的转折点上,还处在了命运选择的转折点上。很显然,我们不能像工业化进程的自然演进过程那样继续后工业化的进程,因为它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可能会导致人类及其生存的地球在瞬间彻底毁灭,因而,我们应当自觉地规划人类的社会治理,自觉地进行政府模式变革。

我们看到,在工业社会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下,管理型政府通过各式各样的控制手段去对知识进行管理,从而建构起了一种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这种知识应用体系所支持的是人们之间的竞争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工业社会的知识增长都是建立在利己动机之上的,因而,就像工业社会的有限开放性一样,知识的共享也是有限的。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中,这种知识共享方式不仅不能给人类社会的创造性活动带来积极的驱动力,反而,使人类无限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被遏制或局限在了有限的范围内。这就是管理型政府的知识管理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是管理型政府自身的一种特征。因为按照这种有限开放、有限共享的逻辑去建构管理型政府及其官僚制组织,其逻辑和现实的结果都是一种封闭的、等级化的中心——边缘结构。而在其社会治理活动中,也在到处渗透着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这就导致整个工业社会陷入领域分化的封闭状态,知识变成了私有财产,并在法律制度的保护下成为个体、组织,乃

至国家通过它来获得经济增长的利器。然而,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并非建立在这种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广泛的知识共享之上的。这种知识共享在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向政府模式变革提出了自己呼声。既然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不利于甚至有损于广泛知识共享的实现,那么,人类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时必然要求政府服务于知识共享之需要。政府模式不应当是管理型的,而应当是服务型的。也只有服务型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才能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政府模式不是去管理知识的应用、控制知识的扩散,而是通过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和开展合作的行动来建构知识广泛共享的模式,从而激发人类社会潜在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服务型政府是在批判和超越管理型政府及其支持竞争的制度之上积极建构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它所完成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合作行动的开展中去建构人类社会广泛的知识共享模式,促进人类社会在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性活动。

## 参考文献:

- [1] Eisenstein E.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M].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558, 559.
- [2] (美)莫基尔. 雅典娜的礼物: 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 [M]. 段异兵, 唐乐,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3] Braudel F.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I: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1: 430.
- [4] Keyser B W. Between Science and Craft: the Case of Berthollet and Dyeing [J]. Annals of Science, 1990, 47 (3): 213-260.
- [5] (英)迈尔 舍恩伯格, 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M]. 盛杨燕, 周涛,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40.
- [6] 张康之.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2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4.
- [7] (美)卡普拉. 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 [M]. 卫飒英, 李四南, 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412.

(责任编辑: 刘浩)

## From Management to Service: Governmental Model's Change in the Vision of Knowledge

ZHOU Jun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starting from the West and extending to the other parts of the human society have promoted the rapid growth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forms. The institution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tightness has compelle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way of imit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lso constructed our society according to this scientific spirit, and achieved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management-oriented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kes the acquisition cost of knowledge extremely low, and knowledge sharing is no longer a problem. However,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society, the more knowledge we have, the more confused we are. With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human society, the cre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the knowledge sharing are emerging, which has shocked the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inking mode of the human society. Now they are spurring people strongly to appeal to the government reform, and according to the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abused of cre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must make proper planning 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and actively construct 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which is a new mode of government.

**Key words:** Knowledge; Imitated Technology; Creative Technology; the Enlightenment; Governmental Model;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